

丁三作品

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

The Blueshirts 蓝衣社

(增补本)



紀律條例

- 一、不得違背主義和領袖；
- 二、不得違抗命令；
- 三、不得洩露機密。
- 違犯以上各條之一者，處以死刑
- 四、不得有小組織活動；
- 五、不得偷生怕死；
- 六、不得貪贓枉法；
- 七、不得吸食鴉片；
- 八、不得娶妾。
- 違犯以上各條之一者，處有期徒刑至無期徒刑



藝文出版社

The Blueshirts 蓝衣社

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

丁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衣社 / 丁三著.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10.2

ISBN 978-7-80241-178-4

I. ①蓝… II. ①丁…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7465 号

蓝衣社

丁三 著

*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E-mail: ywp@ywub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州兴龙印刷厂

*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本 23.5 印张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32.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蒋介石 三民主义力行社社长、“蓝衣社”的最高领袖。

1932年1月，他决心赞助只有六十余名成员的力行社，并将之改造为效仿德国纳粹党、意大利“黑衫党”的秘密组织。在他的支持下，力行社很快发展到成员约三百名，其下属组织有“革军会”、“革青会”和“中华复兴社”，成员更多达五十万。但与此同时，为实现自己的分而治之，他上下其手，使力行社四分五裂、内部倾轧不断。他的这些手笔，引发了贺衷寒、邓文仪等力行社首脑的暗自不满，在西安事变中，他们试图置蒋介石于死地。

滕杰 力行社创始人、首任书记。

他满腔热血而忍辱负重、兢兢业业，是力行社、“蓝衣社”历史上最没有争议的首脑。1931年7月，他甘冒杀身之祸，与未婚妻陈启坤发起了力行社；一年多以后，力行社、“蓝衣社”发展成员至万余人时，却被蒋介石免去了首任书记之职。

贺衷寒 力行社灵魂人物之一、第二任书记。

他曾是黄埔学生的政治领袖，并被视为蒋介石“接班人”的主要人选。在他的手上，力行社发起了第三级组织

“中华复兴社”，成员多达十余万。但为了避免他的坐大，蒋介石支持康泽组建了效仿德国党卫队的“别动队”，使以康泽为首的西南人势力，与贺衷寒为首的湖南人势力从此势均力敌、相互抗衡。

西安事变中，他成为武力解决的主要代表，试图取蒋以自代。蒋介石活着回来后，他被视为有“狼子野心”，从此毕生不得志。

刘健群 力行社唯一的非黄埔魁首、第三任和第五任书记长。

他以一介文人身份，提出“蓝衣社”构想、试图将中国法西斯化，由此得到蒋介石的赏识，被笑称为蒋介石“螟蛉子”以及另一个接班人人选。但他与力行社的其他首脑关系紧张，特别是他散发小册子《中国国民党蓝衣社》、使外界普遍认为力行社就是“蓝衣社”后，更使力行社其他首脑对他怨恨加深。为此，他曾被戴笠追杀，不得已落发为僧，隐居深山。

丰 悌 力行社第四任书记长。

他是蓝衣社的“留欧派”首领，1934年夏出任力行社书记长。他任内表现平平，却卷入了一桩非常重大的政治事件——“刺汪案”。为避免外界误认为自己杀人灭口，蒋介石留下了他的性命，1938年10月，在“长沙大火”事件中被蒋介石冤杀。

邓文仪 力行社第六任书记长。

他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年仅27岁，却负责军长、师长人选的荐任审核，是中华民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但在1934年夏天，却因为CC系、政学系的联手陷害，失去了一切权力。1936年8月，他被任命为力行社书记长，几个月后，在西安事变中，与贺衷寒一同成为武力解决派的主角。

郑介民 力行社特务处副处长、第七任书记长。

他是戴笠的主要助手，但与戴笠面和心不和。他代表了特务处中亲近力行社总社的力量。西安事变后，他被任命为力行社书记长，但已是“看守”书记长。

康泽 力行社第八任书记长、“别动总队”总队长。

他被誉为民国罕见的“组织天才”之一，1933年夏天，他组建了效仿德国党卫队、权势熏天的别动队，被毛泽东视为毁灭瑞金的元凶之一。他也被视为蒋介石最有力的接班人之一，但不久后，他明白了自己与蒋介石只是互相利用关系。1948年5月，在襄樊他被解放军逮捕时，蒋介石以为他一定会“自杀殉国”，为此开了两次追悼会，事实上，此时的他已在西柏坡总结自己的“反动思想”、并痛骂蒋介石了。

戴笠 力行社特务处处长。

力行社、“蓝衣社”解散后，他的特务处被改组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即无人不知的“军统”。

他原先只是个不得志的街头小混混，但1931年秋天，他参与发起力行社后，开始了自己的发迹。他先是被任命为特务处处长，两年多以后又兼并了邓文仪的“调查课”，成为民国主要的特务首脑。1936年，他控制了中国的警察系统，开始效仿希姆莱的“政治警察”制度，被称为“中国希姆莱”。更重要的是，在西安事变中，他与力行社其他人物态度截然相反，跑到西安“殉难”，从此深得蒋介石的信任。

台湾良雄的《戴笠传》认为，没有力行社，就没有戴笠，“即使说力行社只成就了戴笠一人，亦不为过”。

目 录

第一章	“复兴社”的碎片	1
第二章	一夕会	9
第三章	“你们起来呀！”	29
第四章	黄埔众生	39
第五章	雪落无声	55
第六章	八宝街之春	73
第七章	武汉清流	91
第八章	元旦公告	107
第九章	复兴狂潮	121
第十章	“第二期革命”	141
第十一章	别动队	165
第十二章	“新生活运动”	189
第十三章	朝天宫	207
第十四章	武斗	219
第十五章	南昌大火	233
第十六章	华北风潮	249
第十七章	回光返照	273
第十八章	1936年	293
第十九章	西线惊变	315
第二十章	安魂曲	341

第一章 “复兴社”的碎片

1

在纷纭、浩荡的变革年月中，在一个人独处的读书日子里，总有数不清的情绪和旧事，出现在自己的心间。2001年晚春到来的时候，作者和自己的未婚妻，开始了与外界相隔绝的生活。3月，我们终止了那家小小的、生意一直冷清的公司，结算账目、清理债务、封存历年遗留的商业文件……整整忙乱了近半个月。当办公室一片狼藉后，我不无苦涩地对未婚妻说，我们要过“一对住在城里的乡下人”的日子了。

这时候，我们几乎毫无积蓄。而“城里人”的日子非常具体，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都要钱。“当乡下人”，对以后的日子，我们只能有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的计划。

4月，我们开始租住在有一套有着五个房间的公寓里。这是一处修建于80年代初的灰色宅子，已经略显旧败。交付了押金和租金，领到房门钥匙后，琐碎的日子就开始了。与此同时，平静的、读书喝茶下棋聊天的日子也开始了。此后几个月，我们不接待客人，不写信，不看电视，每个晚上都散步，采购大量的书籍。读书之外，我们每晚还必下三盘象棋，然后回到各自的卧室休息。我们从储藏间里找到了一套旧茶具，然后沿着一条大街的茶庄，精心地挑选着茶叶。唯一不让人满意的，就是她每晚都要无数次地赖棋。

虽然是80年代的房子，但这里的采光很好。在灰色的阳台上，我晒着太阳，同时读书。那些日子，我每两天就能读完一本书。

这是我一生中最悠闲的时光之一。但这种悠闲很快就结束了。我们面

对的，毕竟是几个月没有一点收入的日子。不久后，为节省房租，我们搬进了一个只有三间小房的小公寓。这里没有空调，社区里也没有书店、茶馆、朋友，附近没有大学。换言之，我们所习惯的夏天一点都看不到。

读书、买书，却仍然坚持着。

我们和纷纭的外界隔绝着。但在我自己心里的情绪和往事，却不断地被激发。这一年晚春，读书喝茶之外，我还在讲述。倾听我讲述的只有未婚妻。事实上 2001 年的大半个夏天，我都在讲述着一个小小的村庄。那个村庄就是我的出生之地。

我生长在福建沿海的那个小渔村边。在我与未婚妻结识的日子，那个被称作“鹤屿”的小小半岛，生活着大约三千居民。依照相对的姓氏、地形，村庄又分成“东头”、“东澳”、“西澳”这样一些自然村；以东头林姓为例，它还包括了“埕头”、“埕下”、“埕里”、“长房里”几个宗族聚居地。富有趣味的是，每个宗族聚居地一般都以五十家为划分，是自然的认可，而不是任何行政的、外来的界限，让他们这么确定自己的亲族范围。

由于我的许多位密友都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建筑师，而我也读过海德格尔的《建筑、居所、思》，所以我比较注重讲述这个村庄的建筑。村里最重要的建筑有三个，分别是村小所在的祠堂、在后山山腰上的土地庙，以及村委会所在的村民俱乐部。其中祠堂始修于 1800 年前后，是林姓族人扎根鹤屿的标志，土地庙是林姓、王姓、阮姓等共同的神祇，而村民俱乐部则是纯人间的、延续至今的政权标志。这些破旧的建筑，折射了一个村庄二百余年的变迁。

比较次要的建筑，还有一片接一片的民居。民居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王家大厝”。这是一处三进开间、有一些精致处的老屋，包括了正厅、花厅、天井与厢房。正厅的门柱上，镌刻着一副对联，上联写着“开闽第一家”，这纪念的是所有福建王姓的先祖。公元 885 年，是一个叫王审知的河南人，率领他的族人、部曲，使福建真正纳入了中国的版图。后来他被尊封为“闽王”。

和土地庙一样，王家大厝也落成于 1900 年前后。毫无疑问，当初修建王家大厝的是一个乡绅，但在我出生以前很久，这里居住的就都是最普通的渔民了。在几十年的生息繁衍、兄弟析产后，每个家庭都只有三两间小

屋。生存资源的极度匮乏，使兄弟的殴斗、妯娌的闲话，在每处小屋都能见到……

王家大厝最低矮、朝北的两间小屋，和蒙昧、热闹的各处院落隔绝了开来。那里居住着一个村庄里最特殊的居民，他从来不介入别人的是非。他还是王家大厝原先唯一的主人，但几十年了，他赖以栖身的就是那两间小屋。

他叫王天容，是村庄里毛笔字写得最好，唯一上过省城大学堂的老人。同时，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村庄里唯一的地主，和原来“军统局”的特务。

谈到王天容时，一些很模糊破碎的早年记忆，在我脑海里被隐约唤醒了。许多年来，我漠忘了这个人，但事实上我对他并不陌生。对一个原本的地主、“特务”，乡村总有很多村史野话，我就在这些闲话里长大；而在老家度过自己的幼年时，每天清晨，我也总能见到他佝偻着身子，走过几步小街到我叔父的豆腐作坊来买豆浆。

他和我祖父年纪相当，大约出生在 1915 年前后。到我记事时，他已经年近古稀了。我恍惚地记得，他的身体异常瘦小，腰弯得像一只大虾，头发一直是全白的。他又是一个非常整洁的老人，春秋两季总穿着一身浅色的乡下休闲服。在我十几岁时，父亲还对我谈起过他。父亲告诉我，他是乌石山师范学堂毕业的，那是福建最早也最著名的近代化学堂之一；在他考取该校的那一年，全县被录取的人数不过十三人。

二十三岁时，王天容就回到了我们村庄所属的集镇。从此，他教书、为人写对联、当校长，是受人敬重的“天容先生”。在那个几近与世隔绝的小岛，他还经常搭乘一条乌篷船到省城，开会、买书、和形形色色的人交谈一些“国事”。土改划成分之前，他家的年收田租是 250 担稻谷，在凋敝的乡村，这是很大的一笔财产。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地主。

但他也是乡间公认的一个“好人”。据说他从不逼交田租，有时还救助佃农；他的后半生，田土房屋被瓜分一空，却更加安分守己、处处息事宁人。他犹如一颗乡下的草籽，短暂地被风吹到城里，又被吹回，并终老于故土……

这样一个和善的“先生”，会是令人憎恨的特务吗？

他怎么也不能和我心中的特务形象联系起来。为此，这个晚上，我拨通了几个电话，询问一些他的相关情况。

第一个电话给了我一个堂叔公。他长期是我们的村长，但落选为普通村民后，他对许多事物都很有牢骚。他又是个闲不住的人，从此非常热心地续修族谱、重修祠堂。他先是奇怪于我的电话，因为，那个村上的地主、最早的近代化先生，已经在大约十年前去世了；这样的任何一个人都想大发其财的年代，谁还会对那样的老古董感兴趣呢？

可能是太寂寞的原因，堂叔公耐心地告诉我，“文革”时他是民兵连长，曾无数次讯问、批斗王天容；王天容自己也交代过，他是军统局的人，他是在 1936 年夏天加入这个特务组织的。因此，对他的“结论”不会错。

堂叔公说话的口吻，既一本正经又多少有些滑稽。我不怀疑他的话。但更大的疑问却在这里产生了：众所周知，军统局是国民党“武汉抗战”时期组建的，时间应该在 1938 年左右；那么，王天容怎么可能在 1936 年加入军统？

我的第二个电话给了我父亲。他和王天容小有交情，应该知道更多的根底。但听完我的疑问后，父亲也只是意味深长地说，王天容是他比较敬重的一个长辈，人品、学问都没有什么问题；那个年代，基本上是审问者要什么结果，被审者都会回答，“是的”……

我认同了这个说法。我点了一支烟，打算吸过烟后就去洗澡。但父亲的电话一会儿又来了。父亲语气很不肯定地说：“想起来了，王天容入的好像不直接是军统，好像是一个和军统有着很深关系的、叫‘光复会’的组织”。

王天容不可能加入过光复会。这个团体比他还要古老，1904 年，在一个暗杀组织的基础上，后来的北大之父蔡元培发起了这个成员不到三百人的秘密会社。但它从未流传到江浙之外去，更重要的是，辛亥“光复”后它就解散了……

我几乎要挂掉电话了。但幸好我随口问了一句，“会不会是复兴社”？

父亲立即地、少见欢畅地回答我：“是的，是！天容先生自己就对我说过，谁去记得这个呀。是是，就是复兴社。”

复兴社，我就有隐约的印象了。大约十年前，我在福建省图书馆自学时，曾接触过一两份相关史料。史料的行文都很简短，但都提到它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并且是一个“秘密的特务组织”。后来偶尔阅读的一些传记、回忆录乃至小说，也不断印证着复兴社的这个性质：以《一二·九运动回忆录》为例，众多当事人纷纷谈到与“复兴社特务”的斗争；以《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为例，在“1950年”一条，包括了人民中国对旧社会、旧人物的镇反。在几十万名绑上刑场的“反动分子”中，许多人的罪名就是“复兴社、三青团潜伏特务”……

谈到复兴社时，这些史料都只是顺带一笔。但，复兴社和“三青团”有着特殊的历史联系，它是一个“特务组织”的说法，却几乎众口一词……三青团的很大一部分成员，或是民国的教书先生，或是高中以上的在校学生，王天容接受过大学教育，后来又是一个乡村教书先生，他的加入复兴社，似乎丝毫不让人觉得意外。

但疑问却在这里继续扩大：既然如此，作为三青团前身的“复兴社”是怎么回事？从字面上看，它不是一个党团，而是社团。在蒙昧的民国，城市是一个个生活的孤岛，但社团却多如牛毛，区区一个社团，怎么可能成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前身？

王天容是怎么加入复兴社的？复兴社有着怎样的秘密活动，以至被认为是一个特务组织？最后，复兴社和军统局怎么又有关系了？

这些疑问斑驳地缠绕着，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疑团。显然，复兴社是一个大有来头的组织，否则它不会和三青团、军统局发生什么关系；它又肯定是一个异常神秘的组织，对它，无论教科书、传记作品还是历史学书籍，都只是讳莫如深地提到一笔，以至于大多数人没有注意到它。

2001年夏天是闲适的。既然无事可做，读一些书也是好的。当晚，我没有摆下棋盘，也没有继续讲述，而是换上宽松的睡衣，开始阅读一些民国的相关史料。

我的阅读从书架上的几十本《文史资料选辑》开始。这些书是我从旧书摊上淘来的，翻阅过目录后，我就让它躲进书柜角落去蒙受灰尘。几十年来，各级政协都设立了一个“文史委员会”，编撰刊物并发表政协委员的回忆文字；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初，拨乱反正、百废待举，大批原国民党军政要员重新获得了社会地位，从战犯、历史罪人变成政协委员，在这个时期，他们一般都已步入风烛残年，一生的荣耀、落寞、酸楚、浮沉，也就化作各个回忆文章的字句……

作为口述史的开端，《文史资料选辑》的众多文字，不仅是可信度很高的史料，它还隐藏着一个个昔日大人物的面貌、命运和思考。它是“历史的影集”。透过它们，众多历史细节乃至被湮没的事实、“真相”，都得以流传。

它也记载、流传着一个极端秘密，到今天已鲜为人知，但躯体庞大、曾经权倾一时的组织，复兴社。这个晚上，翻开第一本《选辑》，我就读到了一个原复兴社成员的回忆文章。他的名字是龙步云，所撰写的史料，标题是《中华复兴社内幕》。

龙步云，湖南籍贯，职业军人。在达官显贵多如牛毛的南京，他只是区区一名校官；在复兴社内，他的地位也不高，只是中层骨干。但他自称，他长期在“复兴社总社”担任组织处助理干事，因此得以与闻许多“内幕”。他先是言语确凿、如数家珍地谈到，复兴社成立于1932年3月初，解体于1938年春夏，历时6年有余；它以“民主集权”、“书记负责”为原则，下设七个处。在书记处、组织处、宣传处、总务处之外，还设有军事处、训练处、特务处……

军事处？训练处？特务处？这丝毫不像一个几杯清茶、一群文人、长袍马褂，谈些问题也说点主义的“社团”。紧接着，这个复兴社骨干又谈起了自己的一群上级，那些复兴社的大人物。

谈到复兴社大人物时，龙步云用的字眼，有着浓厚的黑社会色彩。比如它的四个主要魁首、“四大台柱”，被称为“四大金刚”；它的魁首群体被称为“十三太保”……这不禁让人产生了一丝疑惑：难道复兴社是一个黑道组织？

在龙蛇混杂的民国，黑社会作为一股力量，也时常登堂入室。但，龙步云很快列举了所谓“四大金刚”：在贺衷寒、邓文仪、康泽之后，它的又

一个“金刚”，名字是戴笠。

在中国现代史上，戴笠这个名字可谓振聋发聩。他参与了众多民国最重大的事件，直到今天，大量的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都还有着他的事迹和形象；他权倾民国，并且一生都和令人“闻风丧胆”、“毛骨悚然”这样的描写联系在一起……

复兴社，它居然包括了戴笠这样的魁首？

戴笠的权力根源是军统局。军统局是如此臭名昭著，以至于被视为特务政治的一个象征、一种缩影。在其短暂的历史里，它控制了无数的内外围组织。那么，复兴社是不是军统局的外围组织之一呢？

事实却恰恰相反。在又一份史料的开篇，一个前军统局要人写道：“军统局的前身是复兴社特务处。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时，在南京鸡鹅巷 53 号办公……”

也就是说，复兴社不仅是三青团的前身，它下属的一个处，更奠基了后来无处不在的军统局！一时之间，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仿佛看到了厚重的历史帷幕之下，那数不清的“内幕”与真相。三青团是民国最大的青年党团，军统局是民国最大的特务组织，但它们却来自复兴社的“一分为二”！

关于王天容的疑惑，似乎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这个深夜，我仿佛看到了一幕幕年代久远、线索贯穿的图景：在老家自幼见到的那个地主、“特务”，在他十八九岁、还是一名普通大学生时，他就加入了异常隐蔽、面貌诡异的“中华复兴社”；然后，因为三青团、军统局替代了复兴社，他也就成为三青团团员、或军统局的基层特务。在后来的年月，伴随着政权交替、时世变迁，无论他有没有参加过特务活动，他的这个阅历连同他的地主成分，使他沦为一个村庄的政治贱民，直到渐渐老去……但，这时候，比起王天容，我更感兴趣的已经是复兴社本身了。

就这样，这个夏天，从一个芥豆之微、生活在我老家渔村的“老地主”开始，我走进了尘封的民国、尘封的复兴社。

这个晚上，我阅读了大约四五十份复兴社的史料。阅读整整进行了一个通宵，直到天色泛白，我还没有丝毫倦意。心理学有一个术语，是“体验的巅峰”，当一个人置身于前所未见的环境时，很容易产生一种“忘我”的、近乎梦境的感觉，种种滋味纷至沓来，美妙、苦涩、崇高、酸楚、感叹、浩荡……似乎天地在运行、时间在行进，自己也与宇宙先人水乳交融、恍若一体。这个晚上，那些零散、陈旧的资料，就让我有了这样的体验。

次日清晨，在草草一觉后，我来到了福建省图书馆。

在我的早年岁月里，福建省图书馆是有着重要痕迹的一个场所。我最暗淡、最凄寒的青年初期，就在那里度过；关于复兴社、三青团的最早记忆，也是在那里产生的。当出租车冒着小雨，把我送到新省图的门外时，一种恍若隔世的情绪，就自然地滋长出来了。我怀着一种近乎肃穆又略略酸楚的情感，走进了新省图。

在新省图无边无际的书架边，渐渐地，关于复兴社、“蓝衣社”的旧事，犹如一幅浩大的画卷，色彩斑驳而又线条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了。此后几个月，不仅是对我老家乡下一个普通老人的命运，而且对他曾经隶属过的“蓝衣社运动”，我都产生了深刻的关切。我仿佛在和一小群才华横溢的民国青年对话，在蒙昧、破碎的民国图景上，他们先是号哭、绝望，然后，因为一些特殊的契机，他们集结了起来，发起了“蓝衣社运动”，并领导了中国的青年。最后，因为身不由己的命运变迁，他们被集体地、鲜明地钉在耻辱柱上，似乎堕入阿鼻地狱，永世不能轮回。我仿佛看到，其中几双满含着泪水的眼睛，一直悬挂在图书馆灰色屋顶外的天际间。他们哀伤地注视着自己参与缔造的中华民国，一步步地堕落下去。

第二章 一夕会

1

复兴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日本。

1929年，东京先后迎来了第三批中国留学生。这些学生都很年轻，全部九十人，清一色是现役军人，也全部毕业于中国南方的黄埔军校；来到日本后，他们散布在各文武学校内，“例如早稻田、明治、陆大、士官、户山、炮兵、经理成城等”。在最初的日子里，他们目睹了一个生机勃勃、文明开化的日本。

明治以下，历经三代，日本成功实现了社会转型。一个民众蒙昧、血腥气息浓重、军刀价值被极度强调的领主国家，包围在一种西方文明的清新里。机械、贸易、现代军队、义务教育，制造出了洋溢在空气里的自信。后来，时为日本驻华公使的重光葵，在《昭和的动乱》一书中概括过这种信心：“日本代表亚洲迅速地成为世界五强，进而为世界三强之一，在西太平洋处于领导的地位。日本……对于人类的文化负有极为重大的责任。”

与这么一个日本相对比，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大致同时进行，但甲午战争却构成了两国截然相反的历史分野。辛亥光复后，在官吏腐败、列强横行、鸦片泛滥、农村破产之外，中国又添上了军阀混战这个要命的毒瘤。“闹华五鬼”会聚齐全了。几十年后，一个黄埔学生这么感慨自己的东京见闻：“（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既多，政治派别亦很复杂，有共产党员，有青年党员，属于国民党的又分西山派与汪精卫的改组派。派系间的冲突时常引起打斗之事，正反映了国家政治的混乱状况”（邓元忠，《任觉五访问》）……

为抵制其他党团、派系的渗透，他们遵照南京指示，组成了“黄埔东京同学会”；他们频繁往来，有时三五个人，有时全体参加，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聚餐会。后来，毕业于黄埔四期、时为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科留学生的滕杰，这样回顾自己的东京生活：“每月有政府津贴一百二十元，但只需用四十元，大部分钱都用来买书”；“读书方式很自由，听讲、指导或自由研究皆可……每天到上野图书馆读书，早去晚回，连午餐也是在图书馆地下室吃”……

这样的留学生涯，让滕杰久久难忘。但，不过几个月以后，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潮就席卷了日本，也伏笔着他们的命运转折。

几十年后，温斯顿·丘吉尔以政治家特有的冷静，描述了1929年的悲惨秋天：“直到第三季度末，到处都呈现日益繁荣的希望和景况……但在十月间，一场突发的猛烈的风潮横扫了华尔街……”

世界性大萧条开始了。对这股风潮的后果，丘吉尔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轻松来表述，“不过英语世界里没有人饿死”；与此同时，他的目光也投向了遥远的日本：“1929年到1931年的经济风暴，对日本的冲击绝不亚于对世界任何地方”（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何止是不亚于其他地方？短短几个月之后，国内市场狭窄、严重倚赖出口的日本，就出现了大量饥民、难民。大约370万人失去了工作，至于八百万户自耕农，更有接近一半彻底破产了。《妇女》杂志的一篇报道，曾震撼了整个日本：为度过荒年，贫穷的山形县小西国村，将397名少女卖给妓院，成为“没有少女的村庄”；不久后，山形县官厅辩驳说，外出的妇女是397人，“但参加卖淫者仅109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小西国村之后，秋田县的玉米村、下乡村，雄胜郡的秋之宫村……也因为大批少女的沦为娼妓，而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渐渐地，卖儿救穷、“没有少女的村庄”，已经不能再激发什么关注了，举家自杀成为新的舆论热点。

大萧条摧残着一代日本人。后来，历史学家色川大吉谈到，“到了昭和十年也就是1935年，日本女性的平均身高仅为1米48，男人的平均寿命仅为44.8岁”（色川大吉，《昭和五十年史话》）。它甚至使女性的衣着也出现了倒退：由于身体太过瘦弱，许多城市妇女又脱下西式上衣和裙子，换上了和服，以遮掩自己瘦骨伶仃的小腿。